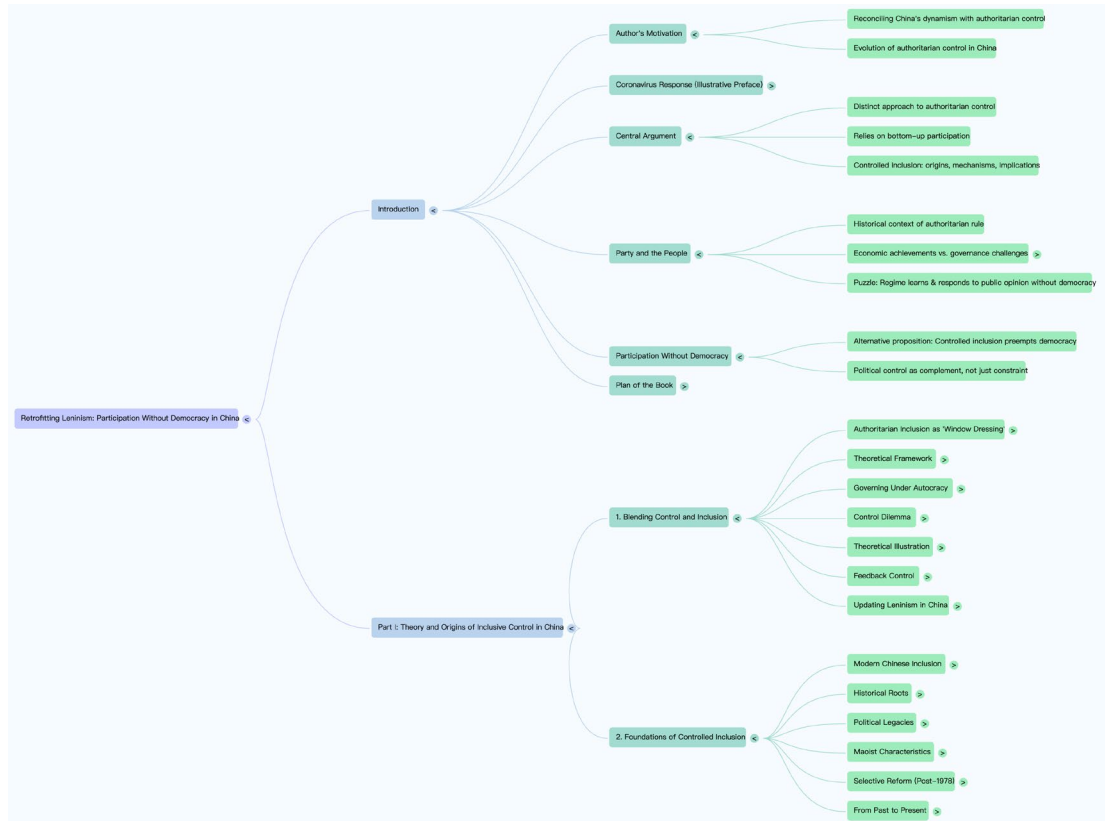


【文献引用】

Gueorguiev, Dimitar. 2021. *Retrofitting Leninism: Participation without Democracy in China*.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政策晴雨表数据：<https://bit.ly/2YXoDQz>

这本书将地方人大置于更广泛的信息系统中来理解，可以放在之前的两本书后面。

1. Introduction

迪米塔尔·D·古奥尔吉耶夫（Dimitar D. Gueorguiev）的《改造列宁主义^[1]：中国没有民主的参与》一书的核心论点首先强调了中国共产党（CCP）在宪法中强调优先考虑人民利益、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同时也认识到脱离群众的巨大风险。中国对新冠疫情的强有力应对就体现了这种内在的矛盾。这场疫情看似象征着自上而下的威权主义，但实际上却是由数百万普通公民作为非正式的国家代理人，依靠公众意见进行技术密集型的追踪，从而促成和执行的。尽管存在侵入性控制，但调查显示公众普遍对监控持积极态度。

本书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公民为何要参与一个限制其自由的制度？本书虽然承认感知有效性或义务参与等可能性，但其核心主张是，中国公众参与并非仅仅因为体制有效，而是因为体制如何运作；参与并非纯粹出于强制，而是出于感知到的参与兴趣。本研究旨在探讨这种“受控参与”的起源、将自下而上的投入转化为自上而下产出的机制及其治理影响。

历史上，威权统治常常受到政策误导和治理无效的困扰，压制不满情绪，阻碍纠正。当前，中国面临着复杂的“第一世界治理挑战”，其政治架构却如同“第三世界”。尽管面临国内压力和国际不满，但中国共产党似乎对民意“高度敏感”，在可再生能源、消除贫困、再分配政策和反腐败等领域投入巨资，展现出积极主动应对新兴治理挑战的态度。

^[1] 所谓“改造”（Retrofitting）指的是在列宁主义的旧框架（包容性控制）中添加新的技术。

在威权主义语境下，这种**回应性**令人费解，因为威权体制通常缺乏有效感知和响应公众需求所必需的政治问责制和公民社会基础设施。学者们指出，**立法机构、地方选举和公民社会组织等“输入型机构”是弥合领导人与公民之间差距的机制，从而增强了政权的韧性**^[2]。然而，中共同时通过审查制度、信息扭曲以及利用先进监控技术进行的“潜移默化和外科手术式”胁迫，维持着无处不在的控制。这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一些人关注包容性的“软”因素（其工具价值和民主化潜力），另一些人则关注“硬”因素（认为包容性仅仅是注定要崩溃的“装点门面”）。本书从这些观点出发，主张一种**“威权主义软硬结合的控制演进”**，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相互矛盾或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民主轨迹。

“没有民主的参与”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古巴和中东也存在类似趋势，这与早期“软威权主义”的概念相呼应。尽管有人认为扩大自由最终会导致对民主选举的需求，但本书认为，有可能实施一种**“受控的包容性，以促进治理并优先于民主”**。本书认为，政治控制是对包容性威权主义的补充，而非仅仅是一种制约。这一框架的灵感源自列宁主义原则，尤其是家长式作风（自上而下控制）和集体主义（同侪控制）为包容性提供了基础，中国和新加坡就是例证，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之上。在列宁主义下，公众谴责和国家镇压属于同一迭代控制系统，这种观点并不矛盾。本书指出，学者们常常误解当代中国的威权主义，因为他们未能解释其列宁主义的前身。**现代电信和大数据进一步增强了政权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使其能够以被动监控和外科手术式镇压取代粗暴的政治暴力。【同时提到了信息、技术和国家强制/濡化能力】**^[3]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来阐述这一论点。第一部分“中国包容性控制的理论与起源”奠定了理论和历史基础。它详细描述了政权如何面临困境：需要公众投入以实现有效治理，但又惧怕民众动员。列宁主义政权，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们历来重视基层的包容性。尽管过去由于信息能力不足而导致失败，但如今正**利用现代技术进行“改造”**。这种改造更新了列宁主义的控制机制，但并未改变其基本的条块分割结构。第二部分“连接投入与产出”通过实证研究了公众参与与政权结果之间的联系。本部分探讨了公民“举报”如何影响反腐败调查（监督），以及公众咨询如何影响政策规划，从而往往使政策决策更符合民意。本部分还深入探讨了政权如何处理大量公众意见，运用“启发式”方法（例如公众偏好的分布或立法提案的多样性）来区分有价值的“信号”和“噪音”。第三部分“下游政策影响”探讨了受控包容性对政策稳定性和公众认知的影响。本部分表明，经过公众咨询制定的政策不太可能被废除或修改，公众参与可以增强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将公民的优先事项从经济绩效转向问责。然而，本部分也提出了对新兴技术（例如监控和社会信用体系）如何破坏传统基层控制机制以及可能削弱党与人民之间关键信任纽带的担忧。

“结论”将反思中国四十年来的发展轨迹，其特点是不断适应，但最终回归列宁主义的根源，并指出这条道路正在削弱人们对民主化的任何乐观情绪。结论还将探讨技术进步如何使更复杂的控制手段成为可能，并探讨其对其他以中国为榜样的威权主义政权的影响。

2. Blending Control and Inclusion

“融合控制与包容”一章概述了一个**将包容性治理与威权控制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4]。该框架认为，**未能将公众意见纳入治理战略的政权可能面临信息和合法性方面的缺陷**^[5]。相

^[2] 这里应该对话之前的研究，即将地方选举和信访制度作为重要的信息渠道。

^[3] 列宁主义在斯科特的《国家的视角》里面也专列了一章，专门提到共产主义国家对于大型项目、工厂生产和先进技术的迷恋，可以作呼应。

^[4] 作者首先纠正了对于威权政治和独裁政治的误解：首先，即便是最独裁的政治，至少在名义上也许奥人们的同意才能实施治理，无论这种同意（Consent）是如何形成的，否则就是资源的空转和消耗；其次，领导者要实现某些目标，也必须依靠下级（官僚）和民众才能完成，这也解释了第一点。

^[5] 在威权中可以形成容忍参与的环境正是如本文所说的原因，其中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对于合法性来说，即使结果上不符合这一预期，参与的过程也会影响到他们对于合法性的看法。

反，鼓励公众参与的政权则面临民众竞争的风险。本章介绍了“受控包容”（列宁主义式控制）作为一种独特的威权控制方法，它矛盾地依赖于自下而上的参与，而现代技术使这一策略更加微妙、可行且更容易被社会接受^[6]。

从历史上看，威权统治往往以政策误导和治理无效为特征，这主要是由于压制不满情绪和阻碍纠正措施。尤其是中国，它面临着复杂的“第一世界治理挑战”，同时又在看似“第三世界”的政治架构下运作。阿马蒂亚·森的观点凸显了威权统治的一个主要局限性：**由于缺乏政治问责和公民社会基础设施，它天生就无法感知和回应公众需求**^[7]。对此，学者们认为，代议制立法机构、地方选举和公民社会组织等“输入型机构”能够弥合领导人与公民之间的鸿沟，从而增强政权的韧性。然而，**中国共产党同时通过审查制度、信息扭曲以及利用先进监控技术进行微妙的定向胁迫，保持着广泛的控制**^[8]。

这种双重性引发了一场学术争论，一些人关注包容性的“软”方面（其工具价值和民主化潜力），另一些人则关注“硬”方面（认为包容性仅仅是“装点门面”，最终会导致崩溃）。然而，本书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主张“**威权主义的控制演进将威权主义的软硬两方面结合起来**”，而不是将它们视为相互矛盾或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民主轨迹。**对威权统治者来说，以牺牲包容性为代价的暴力和镇压充斥着政策与治理的失败，并且威胁政权合法性；而单纯的包容性则会威胁到威权统治的稳定性。但是，在强制（Coercion）和包容（Inclusion）之间保持平衡，可以同时保证稳定性与治理成效。**

“没有民主的参与”并非中国独有，东南亚、古巴和中东也存在类似模式，这与早期“软威权主义”的概念相呼应。尽管拉里·戴蒙德等一些人认为扩大自由必然会导致对民主选举的需求，但本书认为，**有可能实施一种“受控的包容模式，以促进治理并优先于民主”，政治控制应作为补充而非单纯的制约因素**。这一框架的灵感源自列宁主义原则，其中家长制（自上而下控制）和集体主义（同侪控制）构成了包容的基础，中国和新加坡都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执政党都建立在列宁主义原则之上。在列宁主义下，公众谴责和国家镇压并非相互矛盾，而是同一迭代且内生的控制系统的一部分。本书指出，对当代中国威权主义的误解往往源于未能解释其列宁主义的前身。**现代电信和大数据进一步增强了政权的信息收集和处理能力，使得被动监控和外科手术式镇压取代了粗暴的政治暴力。**

公共包容可以缓解基本的治理挑战，因为它允许协商优先于担忧，即使在决策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也能增强合法性，并提供有助于克服有限理性的洞见。然而，公共包容的工具性益处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代议制立法机构可能成为反对者的论坛，选举活动可能引发有组织的反对，从而可能导致民主化。传统的工具主义解释因假设了一种线性关系而受到批评，即控制越多意味着信息越少，未能整合控制结构本身。关注控制，尤其是列宁主义的控制，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威权主义与包容性如何相互补充。

威权主义政权的“控制困境”在于**平衡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领导权斗争的持续威胁**。虽然“分而治之”等策略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依赖镇压和排斥会导致支持度的不确定性，削弱组织能力，并分散资源，尤其是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在此背景下，包容性机构可以通过提供重要的自下而上的信息和合法性，促进领导层的稳定、有效的强制手段以及更好的监督和执行。**理论挑战在于解释一个政权如何从政治包容中获益，同时避免自由化的压力**。如果控制措施能够阻止团体和个人联合起来反对政权，那么自由化就有可能实现。区分选举参与（决定由谁来治理）和非选举参与（决定如何治理）至关重要，因为后者更容易通过选择性议程设置和审查制度来控制^[9]。赫希曼的退出、话语权和忠诚度框架被

^[6] 作者还指出，与其纠结中国为什么会允许公众表达意见和参与（在此之前的两本书已经形成了较为丰厚的见解），不如去讨论党和政府如何处理高度复杂的信息（可以为修改高统论文提供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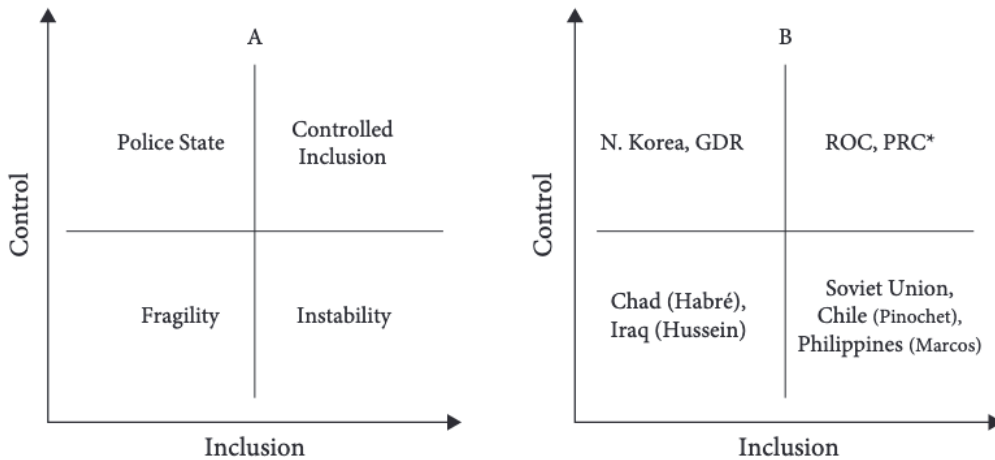
^[7] 在写 Review Article 的时候可以去看最初人们是如何理解威权的。

^[8] 在这里，技术作为信息的控制和筛选器存在。

^[9] 这个政治参与的类型学划分实际上也可以作为腐败论文修改的借鉴。决定事项和决定掌权者的参与经历

用来解释，在退出选择有限的环境下，话语权的受控定义了中国的党国体制。

Figure 1.1. Intersection of Control and Inclusion



作者根据**包容能力和强制能力**的强弱，划分出了威权国家的类型学。在这一类型学中威权国家分为**“脆弱”国家、“警察国家”和易受“不稳定”影响的国家**，并将其与“受控包容”政体进行对比，后者在普遍控制与广泛的公民参与机制之间取得平衡。包括中国在内的列宁主义政权被视为这种“受控包容”（Controlled Inclusion）的典型例子。然而，**受控包容所需的话语权和议程控制难以掌握（例如审查机制需要拥有能自动分类有利和不利信息的能力，而在中国这一机制是外包给社交媒体平台完成的），需要广泛的监督和分工明确的政策制定机构**。受控包容本质上难以维持^[10]，因为它在促进更复杂的组织和经济方面发挥的有效性反而提高了公众的期望，这种现象被迪克森描述为“独裁者困境”^[11]。因此，威权政权选择部分自由化，这会引发腐败等新问题，而**包容性控制**则可以规避这些问题。

公众参与的成功也依赖于公众对政权的感知响应。苏联的包容性控制体系最终因输入处理和响应能力不足而失败。这催生了**“反馈控制”**（Feedback Control）的概念，即**威权控制并非仅仅限制信息，而是实际上有助于处理和调节公众诉求的流动，区分有价值的“信号”和“噪音”，实际上降低了包容带来的稳定风险**^[12]。这种“降噪”机制通过提高协调成本来促进，从而凸显真正的不满^[13]。正如社会信用体系所见，这种划分在之前通过专门的政权控制机构（如公安、信访等政法部门），如今正日益转向数字领域（计算机和算法）。

本章追溯了“中国列宁主义的更新”，指出包容性威权主义的政治战略源于俄罗斯的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植根于先锋党领导群众参与共同目标的理念，由于其强调党的分离和对国家的领导权，从而允许官僚监督和基层联系，因此非常适合包容性**。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将基层动员和群体组织列为列宁主义的核心原则。本书认为，列宁主义下的公众参与体现了威权主义控制的自适应特性。与苏联解体不同，苏联解体涉及选举和非选举参与的混合，以及控制的失败。**中共从这段历史中汲取了教训，避免了民主的外来，并保留了其参与方式的本土根源**。由于长期内战，中国的社会控制更加深入，讽刺的是，这场革命也受益于苏

的掌控和过程是不一样的。

^[10] 威权国家之所以拥抱技术和信息能力，是因为实现包容性控制（为了同时兼顾稳定性、治理成效和政权合法性）需要极强的国家能力，用于识别何种行为/领域需要控制、何种行为/领域需要包容。

^[11] 在这本书中，独裁者困境指的是提高绩效（经济方面的）会提高大众对未来好政府的期待。

^[12] 比如，在实施内容审查的过程中，已经得知了公民对于哪些领域散发的不满，并对此加以针对性调整。又比如，在舆情事件中控制和审查相应的信息，为政府做出合适的解决方案和决策提供足够的时间。这不是简单的镇压概念可以概括的。

^[13] 这里指的是，控制提供了一个“筛选”（Screening）机制，这个机制为所有的集体行动施加了成本，而只有最需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声张利益的人或群体才会被筛选出来（常见的语言如“维权到底”等）。这个筛选机制帮助政权在众多繁杂信息中找到最需要解决的事项。

联人臆想出来的电信革命。“改造”一词描述了这一过程，意味着在未经改变的列宁主义“硬件”基础上添加新技术。

过去其他政权很少采用参与方式，这是因为**难以达到必要的控制水平，以及雄心勃勃、受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所需的大量投资**。中国式的参与方式很少见，主要局限于其他受列宁主义启发的政权，例如新加坡、越南和古巴。一党制政权的制度结构允许更大程度的参与，而无需放弃其主导地位。本章最后概述了本书的实证策略，该策略采用多方法，使用访谈、调查（如中国政策晴雨表）、档案数据和立法记录来对论点的各个方面进行三角测量，特别是技术如何放大公众投入及其对治理的影响，同时承认数据的局限性和偏见。

3. Foundations of Controlled Inclusion

“受控包容的基础”一章开启了对中国包容性威权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探索，认为其真正起源并非源于中国传统思想或西方模式，而是**源于 20 世纪初的共产主义革命**。历史上，传统中国的公众参与十分有限，中央政府主要通过中层官员与民众保持联系，导致其体制类似于“垄断特许经营”，而非深度参与的民众。即使在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国民党也未能显著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也未能引导公众参与政治权宜之外的活动。

1949 年掌权后，毛泽东及其同僚面临着统一和重建分裂国家的艰巨任务，这需要精英、专家的合作，甚至由于官僚机构能力有限，还需要农民、工人和学生参与国家职能。然而，这种内在的参与需求也带来了官僚主义、反革命分子以及党过度受民意影响的风险。中国的党国体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列宁对苏联的设想，该设想将国家概念化为由先锋党管理的“上层建筑”，使其在保持基层联系的同时，拥有监督权和意识形态主导权。列宁主义独特地规定了全面控制，不仅要求群众参与服务于党的控制，还要求通过无处不在的嵌入式控制机构来控制群众本身。苏联的经验以中央全权代表党和人民代表大会等控制机构为特征，最终**未能有效处理群众的意见**^[14]，导致斯大林巩固控制并依赖秘密警察，因为该体系无力管理海量信息，组织失灵。

同样，早期的中国共产党（CCP）采用了苏联的“一人负责制”，再加上官僚机构的无能和官员的暴力，使得重新确立控制权成为必要。国家人民监察委员会（PSC）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CDIC）等正式的控制机构应运而生，同时设立了用于公民反馈的“信访”办公室，但这些机构最初的能力有限，其有效性也因党自身的干预而受到阻碍^[15]。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虽然与列宁的理论不同，强调公众意见是公共利益的“原始数据”，但仍然假定群众批评与毛泽东思想相一致。他的策略包括创建小团体和群众组织，以将社会纳入党国体制。土地改革运动，尽管带有平等主义的口号，却导致农民激进化、社区分裂，并利用内部冲突进行政治控制。户口制度进一步分化和控制了城市人口。然而，中国大陆治理的规模和复杂性意味着毛泽东的控制机构在国家层面仍然基本上无效，导致了有针对性的控制功能，并加剧了文化大革命的不稳定和混乱。

1978 年后，中共领导层意识到经济自由化会加剧社会分化，于是恢复并强化了中纪委和国家安全部等管控机制，彰显了党持续的广泛影响力。这种强化的控制使得诸如价格改革和经济特区（SEZ）等务实的实验性改革得以实施，而这些改革都依赖于严格的经济和人口控制。邓小平虽然对“不守规矩的群众运动”保持谨慎，但仍继续提倡将“群众监督”作为组织控制的工具。尽管措辞有所转变，但挑战依然存在，包括党内高层阻碍调查以及管控机构缺乏专业能力。中国借鉴新加坡“软威权主义”的理念，尝试了地方村民选举和立法专业化，但更高级别的选举改革最终在 2006 年搁浅。1989 年的《行政诉讼法》和公众听证会（例如 1996 年《价格法》的听证会）为公众监督和参与规划开辟了新的途径，使政策制

[14] 苏联的经验的确可以为理解信息处理提供见解。

[15] 公民诉求（Civil Petition）的历史起源。

定者能够获取信息并远离有争议的决策。江泽民于 1997 年正式认可了这种协商方式，并促使其被纳入重要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入世承诺的影响。地方随后制定了自己的协商指南。**从在线投诉到政策咨询，公众参与的快速数字化使公众的不满更加“清晰”(Legible)，增强了党国的影响力，并促进了更复杂的包容和控制形式。**

总而言之，本章总结了三个主要观点：首先，**中国的公众包容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传统实践根基薄弱，且基本未受其影响。**其次，**虽然当代的包容性方法与西方的做法相似，但其根本动机是本土的，而非借鉴的。**最后，**中国的行政体系独特地融合了中国传统经验、国民党的审判，以及至关重要的苏联/列宁主义组织模式。**中共旷日持久的内战使毛泽东得以改进控制策略，并强制依靠群众，从而培育出一种**比苏联更具社会根基的威权主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由于缺乏国家基础设施以及未能将政治与政策分离而难以充分整合公众参与，从而引发了暴力运动；而**现代中共则将群众路线策略与行政良治模式相结合，并通过电信技术加以放大。**这种回归列宁主义根源的历史轨迹表明，虽然中国的技术增强型治理可以提高行政效率，但它可能会导致一个日益压迫和政治排他性的体制，从而削弱民主化的前景。

4. Participation in Oversight

“参与监督”一章首先将中国的包容性威权主义框架化为一种**利用公众参与进行控制的体制**，这与列宁对苏联的设想及其用于社会和组织控制的计算机辅助反馈系统相呼应。该章节认为，**中国的治理依赖于持续的信息输入，其中一些是自动化的，另一些则需要公众自愿参与^[16]**，例如举报腐败或健康违规行为。该章节探讨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公众自愿参与取决于公众相信信息输入会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公众输入必须可识别地转化为政府输出。**本章特别探讨了公民举报与反腐败调查之间的关系，认为这是一个公众偏好与组织控制核心优先事项相一致的明确领域。

接下来是“监督问题”，本章提到了习近平主席 2012 年的讲话，其中指出腐败是党的根本威胁，其根源在于组织腐败，而非个人不当行为。中国的制度结构深受苏联设计的影响，其特点是权力集中在党的领导层，权力分散且头重脚轻。1978 年后的经济权力下放加剧了腐败，因为它创造了与政治关系相关的机会，表明中国的反腐努力旨在控制政治租金的流动，而不是消除政治租金。王明高提出的“科学监督”概念旨在通过公众参与来揭露腐败，从而完善中共的内部控制系统，这与苏联控制论中关于自我培育反馈控制系统的理念相呼应。这体现为“包容性治理”，即行政职能部分向公众开放。“**网络监督**”部分详细介绍了**包容性治理如何将公众参与纳入监督，而庞大的官僚机构使得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督难以实现。**中央政府通过发布大量行政信息(例如最高人民法院的案件记录和国土资源部的土地交易数据)来“授权”公民，实际上创造了数百万个公共审计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于 2012 年底建立了一个众包监督系统，允许公民通过政府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虚拟投递箱提交举报信息。**然而，自愿参与也存在风险，反腐倡廉人士李建新的遇袭事件就是一个例证，尤其是举报通常需要提供个人身份证明。虽然这种风险可能会“筛选”掉一些无关紧要的指控，但它效率低下，并可能损害信任。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但纪律部门仍试图通过保护举报人来缓解担忧，尽管早期法律对在线举报和匿名性有所限制。尽管如此，官方统计数据 displays 公民参与度很高，2009 年至 2013 年间，中纪委收到了超过 30 万条网上举报，据报道高达 70% 的反腐败调查源于公民举报。

[16] 这一部分可以呼应两本将人大作为信息来源的著作。

Table 3.3 Instrumental Variable Estimate of Citizen Reporting Impact

	Treat (DV=Investigations)			Placebo (DV=Audits)	
	(1)	(2)	(3)	(4)	(5)
	Bivariate	Controls	Add'l IV	Controls	Add'l IV
Citizen Reports (log)	1.160 (0.043)	1.052 (0.416)	0.700 (0.303)	0.724 (0.557)	0.759 (0.512)
Provincial Controls		Y	Y	Y	Y
Constant	-3.335 (0.466)	-4.227 (0.708)	-3.909 (0.602)	0.414 (0.883)	0.414 (0.883)
Observations	571	444	375	204	204
Wu-Hausman (p-val)	0.386	0.405	0.789	0.205	0.141
R-squared	0.814	0.867	0.871	0.764	0.764

First Stage: Citizen Reports

Distance to Node	-1.129 (0.069)	-0.142 (0.037)	-0.185 (0.039)	-0.161 (0.050)	-0.171 (0.050)
Internet Penetration			Y		Y
Network Speed			Y		Y
Provincial Controls		Y	Y	Y	Y
R-squared	0.372	0.912	0.922	0.934	0.934
F-statistic	264.414	14.802	10.348	10.383	4.157
Sargan (p-val)	n a	n a	0.375	n a	0.000

在“举报人效应”一章中，本章基于反腐败调查和公民举报的原始数据集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该研究承认，由于腐败率不可观测且存在潜在偏差，仅凭趋势很难得出因果结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章采用了工具变量策略，利用电信基础设施的外生变量，特别是与核心互联网节点的距离，这会影响互联网容量^[17]，从而影响公民举报，但不会影响当前的腐败水平。两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公民举报与纪律调查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公民举报数量每增加 10%，调查数量就会增加约 7%。诊断测试支持了这种工具变量方法的有效性，强化了自下而上举报增加会导致自上而下监督增加的反馈逻辑。

最后，“整合监督”一章的结论是，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关键假设，即**独裁者确实会根据公民提供的信息采取行动，从而建立了公民请愿与反腐败工作之间的直接联系**。报告认为，即使在缺乏正式问责机构的情况下，**技术创新也能增强自下而上的投入**。此类投入使领导人能够管理和遏制与公众产生摩擦的腐败，从而**有助于化解人们对威权腐败的普遍看法**。反过来，这一过程有助于先发制人地满足对民主的诉求，挑战“数字技术本质上会破坏威权政权”的观念。

^[17] 基站—互联网用户和互联网使用—网络公民参与。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MIIT）发布的估计，距离核心节点每 100 英里的距离就会减少约 7% 的互联网用户、11% 的域使用以及 12% 的网站创建和维护。详见本书第 80-81 页，上面有有关互联网覆盖的数据和信息来源。

5. Participation in Planning

“参与规划”一章开篇回顾了威权主义政权在试图征求公众批评意见时所面临的历史挑战，包括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以及“百花齐放”运动时期的中国。这些尝试往往由于控制力不足以及缺乏处理和有效回应批评意见的能力而“失败”。本书的核心论点（本章将对此进行阐述）是，**当代中国已经克服了这些局限性，发展了控制和信息处理的能力，这使得包容性威权主义变得可行且富有成效。**本章重点探讨参与式规划，特别是通过所谓的“结构化协商”。

结构化协商的概念以 20 世纪 90 年代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的工会为例进行了阐述。尽管工会是由中国共产党组织并通常由其主导，但由于法律要求所有权转让必须获得工人的批准，工会成为了至关重要的中介机构。他们成功地通过谈判，为下岗工人争取到了再就业服务和遣散福利，资金来自出售国有企业资产，这有助于缓解劳动纠纷。这一经验为 2006 年《劳动合同法》（LCL）的起草提供了参考。**该法进行了广泛的公众咨询，包括超过 19.1 万条在线评论和通过工会会议收集的 15 万条评论。**政策制定者有意错开咨询活动，以收集来自工人团体和商业游说团体等对立方的意见，使这些“相互竞争的声音相互抵消”。《劳动合同法》最终作为一项可接受的妥协方案获得通过，有效地使数百万工人的劳动关系正式化。这种结构化的协商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工作场所、商业组织、立法程序和公共话语的深度渗透和控制，这使得争议性问题能够公开讨论，而不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对信息流的监视和控制】**。本章随后深入探讨了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承认尽管协商广泛，但真正的民主影响力却有限，**全国人民代表大会（NPC）等立法机构主要充当建设性、非政治性反馈的平台【人大的信息作用】**。尽管研究表明，协商可以提高公众的满意度、信任度和遵从度，但公众意见是否真正影响了政策实质，仍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为了探讨这一点，本章使用了“中国政策晴雨表”（CPB），这是一项于 2016 年启动的全国性民意调查，该调查针对开放和封闭的政策议题，对中国公民进行调查。**CPB 的设计承认并纳入了政权对议题选择和框架的控制，将这些控制视为中国体制的固有属性。**

Figure 4.1. Public Consultation and Policy Choices

CPB Survey Wave	Policy Issue	Consultation	Public Leaning (Liberal to Conservative)	Congruence (Regime & Public)
2016				
	Domestic violence	✓		✓
	Wildlife protection	✓		✓
	Counter-terrorism	✓		✓
	Online privacy	✓		✓
	Foreign NGOs	✓		✓
	Media supervision	.		.
	Urban planning	.		.
	South China Sea	.		.
	Stock market	.		.
	Informal lending	.		✓
2017				
	Public surveillance	✓		tbd
	Ridesharing services	✓		✓
	Nuclear energy	✓		✓
	Chinese medicine	✓		✓
	Exchange rate	.		✓
	Foreign aid	.		✓
	Affirmative action	.		.
	South China Sea	.		.
	Capital controls	.		✓
	Domestic passports	.		✓
2018				
	Trade Protections	✓		✓
	National Security Comm.	✓		✓
	Martyrs	✓		✓
	South China Sea	.		✓
	Foreign aid	.		✓
	Capital controls	.		✓
	Term limits	.		✓

CPB 的实证结果表明，公众咨询与政策决策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2016 年，所有五项开放咨询的政策都与公众舆论保持一致，2017 年和 2018 年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模式。然而，在“封闭式”政策议题上，公众舆论与政府决策之间的一致性较低。尽管官员们经常声称，当公众表达利益时会进行咨询，但调查结果表明，公民通常对未咨询的议题持有明确的观点，这些观点可能与政府立场不同。本章指出，政府官方的咨询指南将“重大利益”和“重大分歧”作为触发因素，赋予了政策制定者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缺乏明确的开放咨询模式，人们得出结论：咨询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反复试验式的学习”。有人认为，受控的咨询使政策制定者能够轻松地了解公众情绪，即使其中存在分歧，并将政策呈现为妥协，正如《地方政府法》所体现的那样。本章的最终结论是，中国的体制虽然不民主，但却有效地利用结构化的公众意见来指导治理和管理公众期望，从而加强了党国的控制，而不是削弱它。

6. Processing Public Inputs

“处理公众意见”一章探讨了威权政权在处理海量公共信息时面临的挑战，这与数字医疗系统所经历的信息过载形成了对比。该章指出，尽管通过在线门户网站、热线电话和举报网站提交的信息量巨大，但中国政府报告显示，这些信息得到了处理和回应。本章旨在了解该政权如何管理这项任务。

中国信息处理的“黑箱”概念化为三个基本原则：信息应填补独裁者现有知识的空白，

有利于筛选和简化，并且能够抵御扭曲。【信息处理的原则，写 Review 核心中的核心，关键中的关键】本文认为，威权政权对话语和沟通的控制反而可能促进这些处理原则的实施。与内部收集的情报相比，自下而上的输入更有可能包含“新”信息，这可能会强化现有的偏见。尤其是请愿和抗议，更有可能涉及政治局外人，因此有可能提供新的见解。

为了筛选和整理这些海量信息，该政权采用了简化方法（信息的结构化）。例如，信访表格要求填写具体细节，例如地点、上访人数和主要议题，立法提案则要求提供信息来源。一种粗暴但有效的策略是向信息提供者（例如信访系统）收取费用，在该系统中，将投诉上报至更高层的难度和风险有助于过滤掉那些不太实质性的不满。然而，这种“钝性成本”的做法可能会阻碍未来的投入，加剧不满情绪，并有可能滋生对社会边缘群体的盲点，最终破坏中共全面控制的目标。

Figure 5.1. Petition Reporting

附件1

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登记表

编号: _____

信访形式		信访时间		信访来源	
信访类属		信访人姓名		单位及职务	
署名情况		单独（集体）		第一次（重复）	
被反映人姓名		被反映人数		被反映人职级	
被反映人单位及职务		Number of petitioners		Main Topic	
被反映人政治面貌			反映主要问题性质		
信访摘要					

填表人: _____ 填表时间: _____ 年 月 日

Note: Generic petitions recording form.

Figure 5.2. Suggestion Reporting

建议

	姓名	代表团	通讯地址	邮编	联系电话
Delegate					
Constituency					

代表对公开此建议有关情况的意见（此为必选项，请代表本人打勾注明）：

同意全文公开 同意主要内容公开（附公开版本）
 同意标题公开 不同意公开

Source of input
 如有以下情况，请代表打勾注明：

1、建议形成来源（可多选）

专题调研 集中视察 小组活动 “一府两院”提供素材
 联系群众 结合本职工作 个人调研 其他

2、提出情况

首次提出 二次提出 三次提出 四次及以上提出

3、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电话沟通 当面沟通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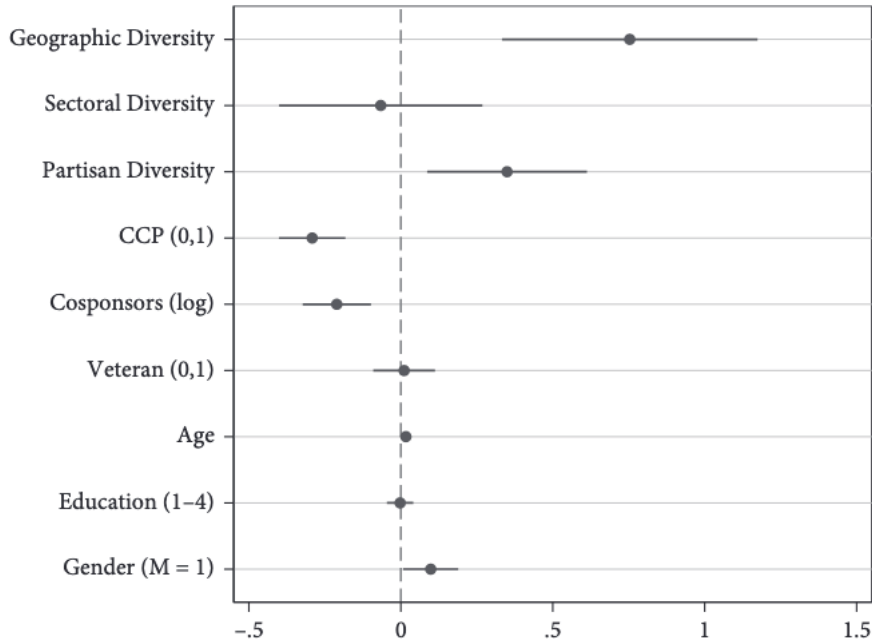
Note: Generic delegate proposal submission form.

本章还探讨了对扭曲的抵御能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因为任何重要指标都可能成为歪曲的目标。在缺乏政治竞争的情况下，列宁主义体制通过行政条块化和社会原子化来体现内部竞争。这些界限意味着公众意见通常局限于基于职能、地域或部门归属的“小群体”，导致以群体为中心的意见（例如，学生代表学生提出学生议题）。当多元化的偏好最终凝聚在一个共同立场上时，就向领导层发出了“包罗万象的利益”的信号。

这种“结构化代表制”可以通过地方人大的例子来探讨，地方人大受到严格控制，即使在立法会议期间也限制代表之间的协调。代表通常代表狭隘的利益群体，例如特定的地理行政单位或行业部门。虽然一项立法提案的共同提案人数量可能表明其支持程度，但这很容易被策略性地滥用。然而，共同提案人的多样性（例如，来自不同的地域、部门或党派归属）可以更有效地表明其支持程度，表明该提案得到了各种潜在竞争利益的支持^[18]。对官员的访谈证实，跨多个代表团的提案被视为政府必须解决的“普遍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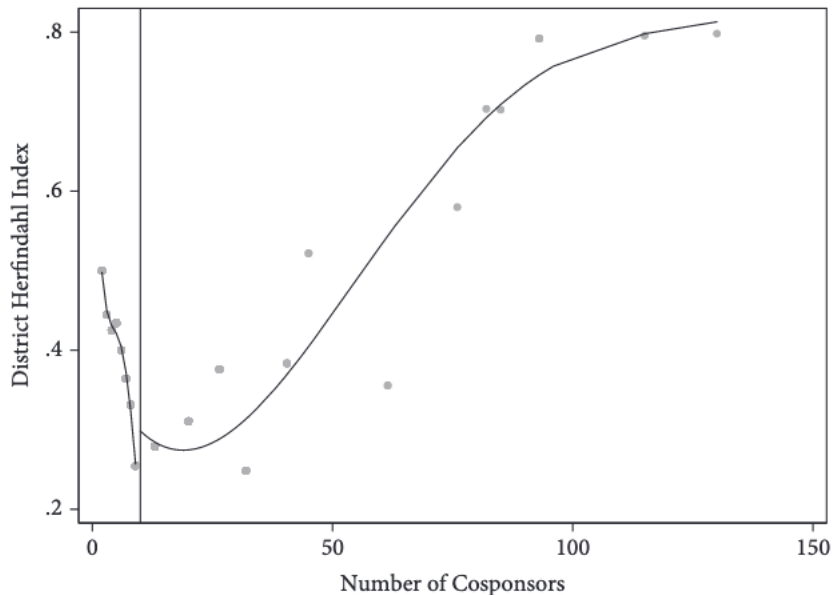
[18] 描述性的多样性得到重视，在上级眼中已经形成了“各方普遍共识”。

Figure 5.3. Predictors of Encompassing Proposals



Notes: Estimates based on Model 4 of Appendix Table A.3. Diversity is based on the Diversity Index specification. Points represent coefficient estimates. Bars represent standard error. Estimate includes fixed effects for legislative session and district of the lead sponsor, as well as robust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on the lead sponsor.

Figure 5.4. Diversity Discontinuity as a Function of Sponsors



Notes: Vertical line represents discontinuity observed at the ten-cosponsor cutoff. Observation markers represent sample averages within local bins, with 26 and 12 bins to the left and right of the cutoff, respectively. The fitted line is based on fourth order polynomial smoothing function. The sample includes all proposals with more than one sponsor and with a nonzero District Herfindahl Index.

深圳市人大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这一逻辑：**提案共同提案的地域和党派多样性越高，提案就越有可能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有趣的是，由中共党员发起的提案平均而言不太可能具有更广泛的议题。本章的结论是，尽管威权主义政权系统性地限制了自下而上的机构，但

这些限制本身也可以充当“内置的降噪器”。通过使指定团体之外的协调成本高昂，该政权确保任何协调参与都具有高度的信息性，并代表更广泛的利益，从而帮助中共维持其广泛的执政授权。

7. Policy Stability and Avoiding Blunders

“政策稳定性与避免失误”一章首先以北京在 2013 年试图执行一项新交通规则却失败的轶事为例，阐述了规划不周的政策的实际后果。由于公众的广泛批评，该规则很快被搁置。该章节概括了这一现象，强调政策失误，无论是像这次交通政策失败，还是像中国大跃进这样更具灾难性的事件，都反映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根本问题，包括缺乏规划、远见和公众支持，以及规划者有限的理性**。民主国家可以利用党派竞争来预防此类问题，而不愿促进此类竞争的**威权主义政权可以利用协商（Deliberation/Negotiation）的反馈控制来替代信息收集和故障排除**，从而实现更持久的政策决策。

本章旨在使用**中国地方政策和在线咨询的原始数据集**来检验这一预期。文章开篇就阐述了主要研究结果：政策起草过程中的公众咨询降低了未来废除或修订的可能性。**2007 年至 2013 年间，611 项省级政策经咨询通过，无一被废除。此外，经咨询通过的政策修订率明显低于平均水平，但这种影响对行政法规的影响更大，对正式立法的影响较小。**

为了量化这一点，作者收集了省级法制办公室和一个中央政府网站的数据，发现 2004 年至 2013 年间有超过 2100 次在线咨询。本章探讨了选择性偏差的潜在问题，即政策制定者可能会选择性地开放某些主题进行咨询，并指出官方指导方针含糊不清，而实际上政策制定者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然而，本章指出，选择性偏差可能与主要假设相悖，因为敏感或未经检验的政策可能会被选中进行咨询，因此更容易被推翻。分析通过比较咨询对类似政策举措（例如地方对国家法律的解释）的影响来缓解这种偏差。对官员的访谈表明，咨询决策基于公众利益（例如，经常被咨询的住宅、建筑、教育政策）以及对时间和精力与公众意见效用的成本效益分析。互联网可访问性和网站质量也会影响在线咨询的可行性，且各省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本章使用三个因变量来定义政策稳定性：政策废除（二分法测量）、政策修订（修订次数）和政策有效期（距首次修订或废除的时间）。这些测量已根据现有的中国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了验证。

Table 6.2 Consultation and Policy Deceleration

DV: Adoption Time (2007–2013)	Regulations			Laws		
	Base (1)	Policy (2)	Full (3)	Base (4)	Policy (5)	Full (6)
Consultation	503.2*** (38.69)	408.5*** (59.81)	121.8*** (32.91)	464.2*** (35.43)	410.8*** (61.66)	110.7*** (27.80)
Draft/Provisional	-180.8*** (67.26)	-245.4** (102.5)	-52.56 (55.15)	-127.8** (49.61)	-153.0** (68.39)	-4.226 (34.57)
Expend per cap			0.047*** (0.003)			0.087*** (0.021)
GDP per cap			0.088*** (0.011)			0.047*** (0.005)
Municipality			75.45 (46.17)			29.77 (36.98)
Minority			45.03 (58.57)			40.65 (60.47)
Policy Arena FE	no	YES	YES		YES	YES
Province FE	no	no	YES	no	no	YES
Constant	18,219*** (32.86)	18,661*** (59.81)	17,166*** (122.2)	18,209*** (29.91)	18,942*** (66.91)	17,232*** (83.50)
Observations	739	739	710	1,072	1,072	1,056
R-squared	0.122	0.470	0.936	0.082	0.319	0.794
Log Likelihood	-5790	-5603	-4616	-8453	-8293	-7532
Clusters	53	53	53	60	60	60

Notes: The DV represents the date when a policy was adopted. The constant on Model 2 corresponds to Jan-10-2007. The coefficient on Consulta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the additional number of days it takes to pass a policy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Base Models 1 and 3 include no controls or Fixed Effects. Policy models 2 and 5 include a Fixed Effect. (FE) for each policy arena. Full Models 3 and 6 add provincial Fixed Effects (FE). Each of the models is run using OLS due to the large amount of fixed effects. Robust Standard errors are clustered on policy issue: * p<.10, ** p<.05, *** p<.01

Table 6.4 Consultation and Policy Amendment

DV: Amendment (2007–2013)	Regulations			Laws		
	Base (1)	Policy (2)	Full (3)	Base (4)	Policy (5)	Full (6)
Consultation	-0.078*** (0.025)	-0.056** (0.024)	-0.062* (0.033)	-0.021 (0.015)	-0.026 (0.022)	-0.022 (0.021)
Provisional	0.074* (0.038)	0.090** (0.041)	0.082 (0.051)	0.047** (0.021)	0.048 (0.032)	0.047 (0.033)
Expend per cap			5.2e-06 (1.7e-05)			-2.6e-06 (6.1e-06)
GDP per cap			-7.6e-07 (5.3e-06)			-4.5e-06 (4.1e-06)
Municipality			0.021 (0.031)			0.038 (0.026)
Minority			0.007 (0.045)			0.0207 (0.046)
Time			9.7e-06 (8.3e-05)			-3.6e-05 (8.7e-05)
Time^2			4.0e-08 (3.8e-08)			3.81e-10 (2.2e-08)
Policy Arena FE		Y	Y		Y	Y
Province FE			Y			Y
Constant	0.105*** (0.021)	0.056** (0.024)	0.054 (0.172)	0.025*** (0.006)	-0.022 (0.014)	0.149 (0.147)
Observations	739	739	710	1,068	1,068	1,052
R-squared	0.016	0.472	0.561	0.008	0.259	0.311
Clusters	53	53	53	60	60	60

Notes: 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s the total number of amendments each policy experiences. Each model is based only on policy arenas that have included consultation. The Policy Models 2 and 5 include a fixed effect for each policy arena to control for heterogeneity between policies that were or were not opened to public consultation. The Full Models 3 and 6 includ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as well as province and year fixed effects. Each model uses OLS due to multiple fixed effects. Robust standard errors clustered on policy issue: * p<.10, ** p<.05, *** p<.01

Table 6.5 Participation and Policy Stability

DV: Lifespan (2007–2013)	Regulations				Laws			
	OLS		Hazard		OLS		Hazard	
	Base (1)	Policy (2)	Base (3)	Policy (4)	Base (5)	Policy (6)	Base (7)	Policy (8)
Consultation	45.840** (18.550)	42.960* (22.200)	-0.793** (0.308)	-1.012** (0.423)	32.600** (15.780)	31.06 (19.490)	-0.741 (0.484)	-0.550 (0.635)
Draft/Provisional	-59.890** (26.900)	-73.330** (28.380)	0.614* (0.318)	1.262** (0.538)	-29.640** (14.160)	-26.420 (18.730)	-0.0108 (0.520)	0.0610 (0.663)
Expend per cap	-0.003 (0.006)	-0.009 (0.008)	0.001 (0.000)	-0.001 (0.000)	0.007* (0.004)	0.008* (0.004)	-0.001*** (0.000)	-0.001** (0.000)
GDP per cap	-0.001 (0.003)	-0.001 (0.003)	-1.6e-05 (3.7e-05)	7.4e-06 (4.6e-05)	0.003** (0.002)	0.004** (0.002)	0.000*** (5.1e-05)	0.000*** (6.6e-05)
Municipality	9.401 (13.600)	11.500 (20.030)	-0.094 (0.241)	-0.290 (0.399)	5.680 (8.863)	0.373 (9.047)	-0.274 (0.328)	-0.193 (0.416)
Minority	14.180 (29.800)	20.120 (34.920)	-0.191 (0.510)	-0.209 (0.884)	6.375 (28.230)	20.53 (26.670)	-0.548 (0.605)	-0.919 (0.820)
Time Controls	Y	Y			Y	Y		

实证结果表明，咨询确实会延迟政策的通过，正在进行咨询的政策平均需要额外约 122 天才能通过。尽管存在这种延迟，但研究结果证实，2007 年至 2013 年间没有一项公开制定的政策被废除。此外，咨询率与政策修订率呈负相关关系，表明被咨询的法规经历的修订较少，也表明原始文件的完整性和前瞻性更强。这种效应在行政法规中比在立法中更为显著，且具有统计学显著性，这可能是因为立法程序本身更为复杂和严谨，这可能会降低咨询所提供的额外信息价值。咨询也显著延长了法规的生命周期，使其延长了约 45 天。

总而言之，本章认为，咨询需要在果断性和坚定性之间进行权衡；虽然咨询会减慢决策速度，但它会提高政策质量。这种机制有助于中国共产党避免“非受迫性政策失误”，而这对于一个自诩绝对正确的政权来说可能令人尴尬。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参与是一种信息生成活动，它使决策者能够学习并随后制定更稳定的政策。此外，公众参与可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将政府政策宣传为具有包容性和协商性，从而消除公众的不信任。

8. Spending Together

“共同消费”一章以“钉子户”的轶事开篇，讲述了一位房主因补偿不足而抵制大溪镇修建新道路的拆迁，凸显了中国公民与地方政府之间潜在的不信任。该章指出，虽然强制手段和幕后谈判在解决此类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但一些决策是通过协商的方式做出的，居民也参与了决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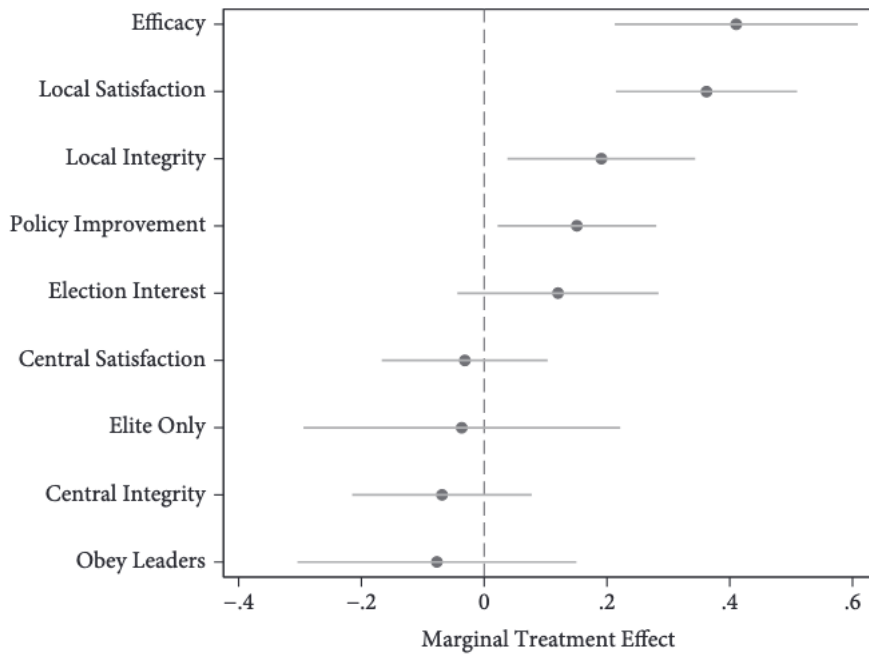
本章随后探讨了公众对中国领导层的认可度为何居高不下，这往往是因为被视为最高层的中央政府将地方治理失灵的责任推卸给民众，并介入保护公民免受“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的侵害。然而，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逻辑”可能会鼓励针对地方当局的集体行动，并加剧人们对国家腐败的担忧，最终削弱地方政府的效率，并可能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执政授权。该章表明，北京过去的应对性解决方案，例如财政紧缩或反腐运动，并非解决基层治理失灵的理想方案。相反，学者们主张采取更具参与性的解决方案来重建信任并解决不满，即使参与过程受到控制。本章阐明了其重点在于“产出”合法性，即关注公众对治理过程本身的想法，而不论结果如何，而非基于绩效的“输出”合法性。它认为，受控的包容性可以通过让公民感到被倾听并增进他们对政府决策的理解来促进这种合法性^[19]。

讨论转向参与式预算，指出其起源于巴西，并传播到拉丁美洲和欧洲，在那里它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中国，参与式预算类似于欧洲模式，注重在预定的菜单中确定支出的优先顺序。它提供了中国财政关系的历史背景，包括 20 世纪 80 年代从中央收入控制转向更大地方自治的转变，这既导致了市场激励，也加剧了腐败。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财政控制权的重新集中化引发了结构性失衡，迫使地方政府寻求其他收入来源，例如出售土地和累积债务，从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制度监督作用，但这些机构缺乏修改预算的权力，这促使领导层寻求“自下而上的监督补充”，例如政府信息公开（OGI）法规和参与式预算试点。广州和成都进行了引人注目的试点。

本章随后详细介绍了浙江省泽国县一项“看似不可能的试点”。在陈逸民和张学明等人的影响下，当地官员积极鼓励公众参与规划和预算编制，以改善公共关系。泽国县的试点项目包括随机选择的居民就支出方案和公共财政进行审议，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代表性问题。初步结果显示，参与者对预算编制过程的理解显著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支出表现出强烈的偏好。包括习近平在内的省级领导人对这一模式表示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度预算审议的基本形式保持一致，尽管后来的会议放宽了将政府官员排除在小组审议之外的规定，并且城镇官员开始发布草案和最终预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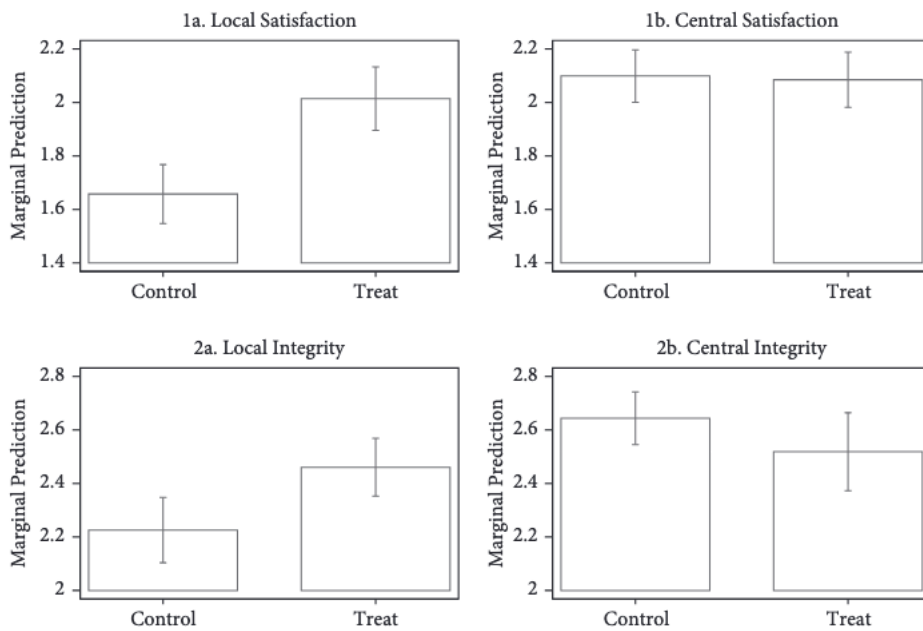
^[19] 我的腐败文章中的 Mediate 或许换成合法性会更加合适。

Figure 7.3. Participation and Political Attitudes



Notes: Point estimates are equivalent to difference in attitudinal means for treatment and control group respondents. Bars represent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difference. Crossing the dashed line indicates an insignificant treatment effect, i.e., no difference.

Figure 7.4. Local vs. Center Effects



Note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n satisfaction ranges on a scale from 1=not very satisfied, to 3=very satisfied. The dependent variable on integrity ranges on a scale from 1="government rarely uses resourc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to 3="government almost always uses resources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ars represent the marginal prediction; whiskers represent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prediction.

为了评估这项独特实验的影响，尽管抽样方面存在挑战，且可能存在性别和教育水平相关的偏见，我们仍设计了一项包含纯对照组的调查。关键问题集中在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对地方和中央政府廉政的看法，以及公民效能和政策改进。**分析发现，参与对地方政府廉**

政和满意度的看法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20]，但对中央政府的影响却基本不显著。参与并没有显著提升人们对地方选举的兴趣，但确实提升了对效能和政策改进的看法。

Table 7.2 Participation Effect on Governance Evaluation

Most Important Quality	Control	Treatment	Difference	Z-test	
				2-tailed	1-tailed
Performance	37.6%	23.7%	-13.9%	0.029	0.014
Responsiveness	37.6%	40.8%	3.2%	0.626	0.313
Accountability	24.8%	35.5%	10.7%	0.087	0.043
N=	93	125		218	

进一步的分析探讨了参与如何影响受访者的治理优先事项，使他们从“绩效”和“响应能力”的平衡视角转向更加重视“问责制”。这表明，参与者不仅改变了对地方治理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评估地方治理的标准。尽管承认实验的局部性及其对政府满意度的认可效应是短暂的，但本章强调了参与对参与者如何优先考虑良好治理（尤其是问责制）的更持久的影响。结论是，泽国镇的受控参与模式，尽管议程和话语控制严格，但仍然表明公民对这一过程表示赞赏，并且它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看法。

在“寻找平衡”一章中，该章节重申，受控参与通过信息和说服提升了合法性，使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实现支出优先事项，并消除对腐败的担忧。关键发现是，在泽国镇，公众参与的好处归于地方政府，而不一定归于中央政府。参与提升了对更好治理的期望，但并未转化为对民主选举的需求增加。这意味着，虽然公民渴望更好的治理，但他们并不一定对这种良好治理的实现方式感兴趣。该章节指出，提高期望值，尤其是在影响集中在地方官员身上的情况下，对中共改善地方治理而言，可能是一项值得的投资。

9. Remote Control

“远程控制”一章开篇对比了海尔集团的商业模式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海尔的成功归功于其“人单合一”模式，该模式有两个核心特征：海量的消费者反馈（例如，调查数百万在线消费者，建立公共讨论论坛）和独特的组织架构。海尔的“冰山”结构包含众多位于基层的小微企业，它们直接与客户互动，并由中间层提供支持，而高层则由一个规模较小、高度可见的领导层进行监督，该领导层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沟通来绕过瓶颈，避免官僚主义。

作者指出，该模式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理论惊人地相似，**强调与最终用户（即公众）的持续接触**。正如海尔利用消费者反馈进行商业决策一样，**中国共产党也利用来自线人、选民和代表的意见进行监督、政策制定和管理**。这两个组织都受益于行政权力下放和条块分割，这有助于收集和处理信息以进行控制。本章认为，**海尔和中共都成功地将列宁主义管理原则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从而实现了与终端用户更快、更无缝、信息更丰富的联系，表明列宁主义与创新并非水火不容**。然而，与海尔不同，中共的政治格局需要对公众参与进行严密控制，选择受到限制，批评只在规定的议题范围内被容忍，意见只有在被邀请时才会被采纳，公民没有“最终用户协议”。

这引出了本章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中国公民会参与一个最终限制他们自由的体系？海尔的顾客出于价值、便利和信任而表示同意，而由于缺乏政治竞争，中共对其公民的信任从未面临真正的考验。更具挑战性的论点是，**公众在某种程度上同意接受控制，是因为他们感**

^[20] 非常符合我当时的理论预期了属于是。

到受到政权的重视和信任，从而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得益于党传统上将社会划分开来，并挑拨群体或个人相互对抗的能力。

本章随后探讨了科技如何将党的角色从依赖于干部转变为补充甚至取代他们。中共正在朝着实现苏联式反馈控制的愿景迈进，即监督、规划和实施由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辅助，并由实时公众输入提供信息。监控技术的普及，包括到2016年超过1.76亿个摄像头（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6.26亿个）、面部识别、生物识别和GPS追踪器，为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公民行踪和活动透明度。尽管这是一个巨大的容量，但监控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和私营公司之间，尽管全国范围内正在努力整合和集中数字监控。这种转变表明，目前涉及数百万人的任务最终可以通过自动化软件解决方案进行被动管理。

积极使用电子政务技术使得公众互动对政府而言几乎免费，这与传统的公共听证会相比成本高昂。政府积极鼓励公民参与，公开提供联系当局的机会，并发布大量信息，例如法庭记录和土地交易。然而，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网络平台的报告，公众参与率自2007年以来一直没有增长，并在2012年左右达到顶峰，当时数字监控投资有所增加。这表明，公众的意见可能越来越多地来自共同的参与者群体，而非普通民众。自民意调查开始以来，公众对政治的兴趣显著下降，这可能是由于审查制度的加强、灌输或政府无处不在的影响。

中国正在兴起的“社会信用体系”（SCS）被描述为一种变革性的反馈控制架构，旨在提高系统的“可信度”。它将强制性信息披露与同事、邻居和家人的自愿贡献相结合，影响着个人的流动性、财务状况和生计。调查显示，公众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支持率极高，公民认为它能够增强彼此缺乏信任的个人之间的责任感。然而，本章指出了一个悖论：尽管公民信任该体系，但社会信用体系却根植于列宁主义框架，这种框架滋生了社会不信任，其前提是公众认为他们无法实现自身的最佳利益。

社会信用体系的普遍性意味着，与过去针对特定群体的活动不同，没有任何个人享有特权或获得信任。一项实验表明，当受访者被告知他们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个人责任时，他们对被政府信任的信念显著下降，尽管他们对政权的信任依然坚定不移。这表明，尽管公民可能信任国家，但他们被国家信任的感觉更加脆弱，并受到无处不在的控制的削弱。

最后，本章指出，虽然技术缩短了治理机构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从而改善了治理，但它也在将控制方式转向被动的数字化替代方案。讽刺的是，如果党与人民之间的“实体联系”变得疏离，自动化控制的成功反而可能使中共在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无处不在的监控和被动数据挖掘可能会降低人们自愿提供信息的动力，并削弱人们对党的忠诚，而不仅仅是出于纯粹的工具性原因。【这个观点挺有意思】

10. Conclusion

“结语”一章以高速航行的海船及其尾迹的比喻开篇，描述了中国在经济轨迹。中国经济在后毛泽东时代（1978-2008）曾是一艘“巨型快艇”，如今由于工资上涨、产能过剩、债务和人口老龄化，增长速度正在放缓。近期中美贸易争端和新冠疫情带来的挫折加速了这种放缓，使得经济机会与政治停滞之间建立的非正式社会契约日益脆弱。

本章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治理的言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诚的，因为其领导人高度重视公众舆论，并将政绩视为可持续合法性的基础。现任政府致力于实现减贫、可再生能源和改善民生等雄心勃勃的目标，旨在将中国提升为“小康社会”并成为全球领导者。中共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得益于其对统计数据的控制和广泛的宣传，尽管一些人仍然对现行政治体制下亲社会的抱负持怀疑态度。本章指出，洪教授的“定向即兴”理论解释了中国快速发展且鲜有挫折的原因：中央领导人设定抽象目标，地方实体则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实现这些目标。然而，该理论也留下了关于中央领导与基层自治之间界限的问题，强调尽管基层的务实主义和坚持不懈至关重要，但它们始终在国家全面控制的框架内运作。在中国，有效的国家控制涉及领导者与民众之间的持续反馈，而不仅仅是权力的授权。

该政权积极寻求、汇总和利用公共信息，用于监督、规划和实施。技术极大地增强了这种努力，提供了计算机辅助的包容模式，实现了与公众和信息收集的近乎无缝的对接。

本章引用了诺伯特·维纳的名言：“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任何不能接受这一点的唯物主义在当今都无法存在。”强调苏联控制论专家借鉴了维纳的观点，但他们的的方法表明，缺乏政治关联的信息控制最终会导致官僚主义化。这一历史背景揭示了当代中国的一个悖论：**中共如何通过优化信息控制来改善治理，同时又推崇个人主义和强人崇拜？结论认为，中国的技术增强型治理不太可能走向民主。**本文主张理解中国非民主的发展轨迹，以调整美国外交政策，因为美国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公众。本章还探讨了包容性控制对其他以中国为榜样的控制型政权的影响。

中共历史上最显著的动荡时期是文化大革命（1966-1974年）和改革开放后的头十年（1979-1989年），这两个时期都源于基层社会的过度动员，或权力下放和私有化带来的自下而上的压力。鉴于中共的不安全感和风险规避意识，人们预期它能够通过致力于良政、摒弃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来避免这些错误。这种预期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一些例外。

关于“对冲技术官僚”，中国向算法转型促进了被动监控，从而可能减少对基层投资和合作的需求。此外，社会信用体系（SCS）的非政治化、算法驱动的框架可能会使中共此前利用的中国社会政治群体分裂。这些发展可能会破坏列宁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和自愿参与所依赖的“好公民”联系。**信息控制领域的数字创新也可能鼓励以定向镇压作为广泛社会支出的替代方案。虽然这对威权主义者来说很有吸引力，但它有可能损害公众对政权致力于社会进步的认知，并削弱中共的合法性。**中共通过设定诸如消除贫困和扩大公共卫生等大胆承诺来应对这种情况。尽管这些承诺被批评为“表演性”的，但它们将评估基准从总体收益重新定义为可量化的目标。这种以目标为导向的做法间接地认可了新的镇压形式，并重振了陈旧的基层基础设施。在“对冲民粹主义”一文中，毛泽东的个人权力对系统性控制构成了重大威胁，导致中共在1980年建议反对个人崇拜。尽管前几任领导人都避免了这种崇拜，但习近平在2012年崛起，却令人不安地见证了个人主义统治的回归。这可能是一种刻意强化党的权威和中国传统的策略，其目标是稳定而非革命热情。本章指出，中共的意识形态未来将经过精心调整和平衡，以保持平衡。

这种对冲策略的“机会成本”包括将稀缺资源投入到雄心勃勃的目标中，这可能导致过度扩张。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北京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更加审慎、精准且更具成本效益，尽管被宣传人员描绘成积极的一面，但可能无法在普通中国公民中树立信心。习近平的权力集中模糊了党和国家之间的界限，使得推卸政策失败的责任更加困难。虽然智慧治理、审查制度和宣传工作会有所帮助，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正如新冠疫情应对初期的失误以及美国的无意挑衅。

公众参与的“中国模式”有助于延续和完善政治控制，确保政治分权、权力下放和中共控制。如果这种互补性持续带来治理改善，它将强化政权，削弱政治改革的前景，本质上就是确认“和平演变”理论已死。这不仅是习近平放弃改革，也是中共长期以来对此类事态发展的恐惧及其先发制人的延续。

“数字威权主义”被探讨为中国与西方民主的反叙事，因其技术官僚主义的路径以及通过非政治参与和技术手段遏制社会紧张局势的能力，吸引了那些关注民主民粹主义的人士。其他非民主国家也在投资电子政务和监控技术，在政治自由度下降的同时，治理效率有所提升。然而，技术控制存在局限性，因为许多国家缺乏中国本土的技术基础设施，依赖进口，而新加坡则与中国共享列宁主义的组织框架。随着社会控制和参与日益转向虚拟领域，党与人民之间的“实体纽带”可能会减弱。

在“结语”部分，本章总结道，**中国领导人很幸运拥有积极参与、善于批判的公民，**

而持续积极的公众参与取决于公民是否相信他们的意见得到重视。然而，无处不在的监控可能会阻碍自愿的信息贡献和批判性意见。如果将威权控制简化为社会信用评分，那么超越工具性原因的党内忠诚的本质将受到质疑。本章还强调了对中国公众舆论进行更多研究的必要性，并指出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忽视公众对精英政治以及香港抗议等敏感问题的看法。作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总体上掩盖了我们对中共为何为了实用性、可信度和合法性而采纳公众意见的理解。尽管政府可以利用公众意见和技术来实现良政和威权控制，但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容性控制的可持续性表示悲观，并指出中共对控制和优化的追求可能会进一步疏远人民之间以及与政府之间的关系。